

乡村运动:城市功能的延续

——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内在关系研究

常亮, 贾金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鉴于我国特有社会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三农”问题, 从城市化深刻内涵出发理解城乡关系, 深谙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 将成为破解目前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所出现“僵局”的关键点。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城乡功能演进中农村发展特征的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与日本、韩国乡村发展的对比研究中, 探究我国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契机, 提出:以建立在区域差异性基础上的城市化水平为轴线, 在划分区域功能分工中延续城市功能建设新农村, 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 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 功能分工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1)01-0054-05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和城市(镇)化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①。随着新农村建设实践中表现出的困惑和盲目, 学术界对如何在此大方向之下确立新农村建设的地位, 也就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多数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缩小或消灭城乡差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是打破城乡传统二元结构, 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使城乡呈现一体化的、协调发展进程。新农村建设的基本途径应该是通过城乡统筹消除政府在城乡经济资源分配中的农村歧视^②。与此建立在“城乡分建”立场上不同, 一些学者从国际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通过城市化的方式或者小城镇发展的道路得以实现。因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 而新农村建设也应该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的过程, 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城市化^{③-④}。与之基本一致但在方式选择上略有不同的是以小城镇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观点, 认为我国城乡人口同样众多,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不现实的, 从国情出发, 要解决农村问题, 应该继续坚持小城镇发展的战略^{⑤-⑦}。

由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强势登场, 研究者更多地将其置于矛盾主要方面的位置, 而忽视了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关系的准确辨识, 导致在新农村建

设目标和内容的确立过程中, 既没有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结合, 也未曾与城市化发展不同阶段要解决的发展瓶颈问题相联系; 既没有说明经济、社会、管理等建设目标间的内在联系, 也没有说明新农村建设内容, 特别是精神文明与城市文明间既相互渗透又相互抵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 没有研究城市化目标与新农村建设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明确界定二者的关系, 不仅会带来实践上的迷惘, 而且会造成走弯路和浪费生产力的严重不良后果。因而, 从城乡关系研究中界定新农村建设,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的作用和意义。

二、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城乡功能演变

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形成的城乡功能分离, 即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农村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特征, 使得城市与农村逐渐开始承担起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城乡发展在矛盾“融合”的过程中呈螺旋式向前的状态。

(一) 城市化阶段(Urbanization)

19世纪初, 早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开始进入城市化过程, 以工业聚集为特征的城市发展迅速, 并逐渐在工厂附近形成居民区鳞次栉比、人口稠密; 凡宜于工业化的地方, 新城镇纷纷崛起。这一阶段, 农业为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充足食物; 成为工业产品的需求者, 促进工业新兴市场的发展; 将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贡献作为工业发展的社会资本。

收稿日期: 2010-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西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契合问题研究”(08BJL011)

作者简介: 常亮(1983—), 女, 博士研究生。E-mail: daisychang2004@yahoo.com.cn

①本文在此不特别区分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差异。

松巴特、芒罗、沃伊廷斯基等认为，城市化的界限一般由该国的农业生产力决定，也就是第一生产力是否有余力作为城市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正是农业为工业让利使得城乡政治、经济、社会显著差异不断累积了流动势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非农业部门所吸收，农业人口在空间、职业、观念上开始逃离农村。旨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以农业规模经济为手段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策略就成为了城市化阶段众多国家的首选，但此“双刃剑”在保证城市持续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由于超越了城市承载力形成了与城市繁荣不想映衬的贫民窟。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农业劳动力持续性溢出引起的农业生产水平的非持续性形成的“农村衰落”。

(二) 郊区化阶段(Suburbanization)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交通工具的机动化成为城市空间布局发生变化的决定因素，从而导致了城市空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郊区化的出现。该阶段，大量生产性企业向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迁徙，仍然作为人口密集区的城市主要功能由工业聚集区向商业活动中心转变，旧的城区和贫民窟被予以改造和治理，即城市发展进入巩固期，城市质量的改进成为侧重点。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被挤压出农业，保证农业持续经营得以实现的农业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营性农场规模经济效益开始全面显现，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绝对过剩，各国政府普遍以农业生产计划化、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农产品市场保护等政策手段来弥补在不断的市场波动中农业生产浪费和农民经济损失。

(三) 逆城市化阶段(Deurbanization)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郊区化同时并行出现了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广大乡村回流的逆城市化现象。为了有效缓解“城市病”，发达国家开始实施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战略。人们开始追求与城市社区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要素不同的乡村生活。居住和工作在空间上不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新型工作和生活方式意味着城市和农村的区域功能分化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市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中心，而农村的功能也逐渐上升为生活居住型社区。

可见，无论采取何种体制，工业化发展都要从本国的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也就必然出现农业要素净流出，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的“农村衰落”；与此同时，也都会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发展而出现城乡两极分化。农村的发

展不会一直是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更不应该是“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城市化进程大趋势下出现的普遍问题要求农业发展及时针对性地调整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三、关系化解：乡村发展经验对比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启动了乡村建设运动，比较典型的，如：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起的“乡村发展运动”；前联邦德国也在大体同一时期推行了覆盖全西德的“社区建设”政策；韩国和日本也先后推行“新村运动”和“造村运动”。我国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与上述乡村建设运动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通过与环境禀赋相似邻国韩国、日本的乡村发展的对比，将从中探究我国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契机。

以国家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为动因，在农业发展政策的推动下，日韩两国城市化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韩国用25年时间使得城市化率增长了45.7个百分点，日本用27年使得城市化率增长了39个百分点；然而，也正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同时引发了工农业失调，城乡差异扩大以及劳动力人口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造成的农业生产发展后劲不足等诸多困境。以韩国为例，20世纪中叶其主要力量还集中在工业基础和城镇建设上，城乡之间处于失衡的非良性状态，农民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住茅草屋，点煤油灯”成为1970年以前80%农民的生活写照^[8]。正因如此，日韩两国分别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在政策取向、资源配置、舆论导向上倾向农村，并从行政的角度建立了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从而完成了从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韩国“新村运动”是一项农村、城市、工厂企业联动的全国性运动，通过基础建设—扩散—充实提高三个阶段，仅仅用了18年时间就使得农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9]。从农村发端的“新村运动”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被逐渐引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逐步“离农”。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形成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夯实了基础；同时，也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度拥挤”的社会问题。强调工农互促并进的韩国“新村运动”在工业支持下的乡村建

设、农民增收效应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改善，也就自然创造了强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拉动，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成为了一条康庄大道。毫无疑问，韩国“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日本在二战后为迅速重建城市，把主要资源集中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大都市上，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到城市。1955—1971年间，非农就业人数比重从61%提高到85%，总数达4340万人；同期农业劳动力从1600万人减少到760万^[10]，造成“农村过疏”，加之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沉痛打击，资源匮乏、财政负担过重引发了“自下而上”的“造村运动”。日本城市化主要是推进日本农村的城市化，最具知名度且影响力扩及全日本乃至亚洲各国的就是“一村一品”运动，即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以行政区和地方特色产品为基础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增加了农民收入、刺激了农村多元化的消费；运动内容由农业扩展到整个生活层面，运动地域由农村延伸到城市。可见，日

本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不仅体现在人口城市化水平方面，还体现在大城市圈、大都市带的生成和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与日韩两国相似，我国农业也是以人均耕地面积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在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化的政策背景下，势必也需要“事后补救”——新农村建设。相比较而言，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时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约低30%），农业现代化在科技水平、机械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与产业化水平上与日韩两国存在显著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发展政策，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虽然我国政策领域早已对此讨论过并提出相对应策，可实际上不仅没有缓解城乡差距，反倒愈演愈烈，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帕累托改进。更为尴尬的是，新农村建设经过几年的实践，仍然徘徊在造样板、赶会场、四处参观考察学习和漂洋过海取经的局面，基层政府工作上的困惑和盲目使得大家想有为而不知何以为，导致新农村建设“虎头蛇尾”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后继动力。日韩

表1 韩国、日本、中国乡村运动对比

国家	韩国	日本	中国
乡村运动	新村运动	造村运动	新农村建设
起始时间	1970年	1970年代末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
背景	“出口工业战略”引发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工农脱节，城乡差距拉大	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农村人口急剧流向城市，地域间差异扩大，传统的村落社会迅速崩溃	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引发“三农”问题日益凸显
农业现代化	发展商品农业	科技先导型现代农业；农业专业化、商品化和农业一体化经营	农业科技水平、机械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与产业化低，农民组织发育程度不完善
城市化水平	1960年28.3%发展到1985年74%	1950年37%上升到1977年76%，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1980年为76.2% ^①	1978年17.92%上升到2001年37.7%，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2005年达到42.99% ^②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大城市及其周围人口过密	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大；农村青年不断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农村呈现“993861”；钟摆型流动打工人口形成“兼业化经营”
指导原则	工农并行发展相结合	以区域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主要内容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与居住条件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新村运动向城镇延伸；较快地发展农村经济	增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产业振兴，发展农村工业；加强总体规划，健全法规体系；推行广域行政，实行町村合并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主导力量	政府—农民主体—民间组织（全国内国民运动）	政府主导	政府引导，农村基层主导

注：①表1中，韩国、日本城市化数据来源：李辉，刘春艳.日本与韩国城市化及发展模式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8(4):46-50.

②数据来源：付恒杰.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03(4):18-21.

表2 城市化与人均GDP^①

城市人口比重/%	5~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人均GDP/美元	372	374	820	1 087	3 621	6 424	9 960	8 569	10 757

两国乡村建设中的经验无疑说明:城乡融合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更高境界,旨在重构乡村空间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乡村建设和规划势在必行。这就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即新农村建设是通过城市化逐步将农村问题向城市转移,而并非在农村内部寻找解决途径。

四、新农村建设策略:以城市化水平为轴线

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是城市引力场的形成和不断扩大的过程,而其引力场的扩大并不单纯依靠城市自身“聚合”而释放的能量,最主要的是不断从乡村中吸收更多的新的可供其聚变的“原子”。当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理念等一系列城市引力载体扩散和传播到乡村,乡村便开始发生裂变,释放出强大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推力,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实现乡村分化和为城市提供充足劳动力,推动乡村居民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轨迹中可见一般,城市化不简单地是人口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还包含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传统农业价值和观念在城乡文化矛盾碰撞中以扬弃的方式而熔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

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2 52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45.68%,城市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655个^[11],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但与表2中的标准相比,城市化水平却相对滞后。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城市化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结构性问题,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东西城市化水平差距达18.9个百分点^[12]。城市化水平在宏观层面的显现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微观主体的现实情况,基于此,城市化进程在聚变引力和裂变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必然出现的“农村衰落”的一些普遍问题也就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特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环境中产生了以“三

参考文献:

- [1] 田丰,潘义勇.新农村·新农民·新思路——“固本强基葆先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2006(1):146.
- [2] 严伟.建设“新农村”不是把农民留在农村——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彻底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J].社会科学战线,2006(2):224~229.
- [3] 林毅夫.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点建议[J].金融经济,2006(4):15~16.

^①数据来源:《世界经济》1989年第12期。在5~19组删除了阿曼,在30~39删除了巴巴多斯。此外世界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那个最低的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为5%,故第1组从5%开始排列。

农”问题为表现形式的特殊反映。因此,只有准确界定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才能保证农村和城市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农村发展特征表现出农业在城市化阶段的地位不尽相同充分说明了农业、农民和农村承担或履行的主要职能是随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乡村运动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以推动和服务于城市化的阶段演进为起始点的。依据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高佩义,2004),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某一值(如20%~30%),城市文明的普及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快。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城市人口数,全社会享受城市文明的程度高于城市人口的比重所反映的程度(表3)^[13]。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是文明、先进的生活消费习惯、文化、价值观念等不断通过城市辐射带动向农村渗透的过程,通过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不同社会和经济功能的两个组成部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物理迁移和化学熔合,最终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划分,满足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

表3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文明辐射水平 %

城市化水平	10	20~30	30~40	50~70	70~80
城市文明普及率	10	25~35	35~50	70左右	90~100

因此,本研究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孤立事件或临时任务,更不是单纯的农村事务;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其服务于城市化发展,是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不断调整。新农村建设任务取决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矛盾的演变。新农村建设在目标和任务方面的进程设计,在建设模式及其实现路径选择等方面,都必须以区域城市化进程为参照系,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相契合,适应并服务于城市化发展。亦即是说,新农村建设策略是以建立在区域差异性基础上的城市化水平为轴线,通过区域功能分工,延续城市功能建设新农村,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

- [4] 陈莉, 司武飞, 朱天明, 朱德开. 县域经济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支点[J]. 经济研究参考, 2007(59):49–52.
- [5] 邢久强. 充分发挥政府和农民两个积极性——著名学者温铁军谈新农村建设[J]. 前线, 2006(1):37–39.
- [6] 韩涛. 茅于轼: 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同时进行[J]. 城市开发, 2006(4):32.
- [7] 易国锋. 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纽带[J]. 农业经济, 2008(5):9–10.
- [8] 孙育红. 从日本、韩国有关情况看我国农业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 现代农业, 2008(3):46–48.
- [9] 张秀凤. 国外城市化实践对我国西部城市化的启示[J]. 经济纵横, 2009(2):46–47.
- [10] 金善明. 现代日本经济论[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549.
- [11] 毛志忠. 韩国新村运动及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J]. 经济问题, 2007, 332(4):87–89.
- [12] 上海商报. 我国城市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EB/OL]. (2007-10-15)[2010-03-16]. <http://news.rednet.cn/c/2007/10/15/1345236.htm>.
- [13] 高佩义.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133–134.

Rural Movement: Continu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CHANG Liang, JIA Jin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hanxi Yangling 712100)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hree-rural” issues under our peculiar socio-economic system,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becomes a key point in breaking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talemate. Through analyzing rur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urban-rural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article compare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rural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Korea in order to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trategy was the extension of urban functions and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a new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vision of the regional function from the axis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based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functional division

[责任编辑: 孟青]

(上接第 53 页)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od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Model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LI Gongxiang¹, YIN Yilin^{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2.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attribute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od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model could be selected from project govern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level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solve the allocation problems of concessionary construction right and operating right from the project governance level, concessionary operating right mode was adopted to implement profit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uild-transfer mode was adopted to implement non-profit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from the project management level, division concessionar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mode was adopted to implement the complex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Key words: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operating attribut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ode

[责任编辑: 孟青]